

统战工作史料

选 辑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3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三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三)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 三 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三)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11074·566 定价 (六) 0.78 元

内 部 发 行



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接
见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时
的合影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丙午六月二十日作

餘應

景宋仁久教

魯迅



鲁迅先生《悼
杨铨》诗手迹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
日上海法学院学生向市
政府请愿队伍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
日请愿学生会见吴国桢
时的情景



目 录

纪念杨杏佛烈士殉难五十周年刘澜涛(1)

科学先驱 民主勇士严济慈(3)

——纪念杨杏佛先生殉难五十周年

怀念杜重远先生为革命献身张承宗(8)

杜重远和韬奋的友谊沈粹缜(12)

悼张执一同志杨显东(15)

记张执一同志在上海的几件事李正文(21)

怀念张执一同志田云樵(26)

张执一同志在抗战前后的活动陆 诒(32)

在陈鹤琴先生支持掩护下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朱泽甫(37)

褚辅成与上海法学院学生的抗暴斗争高景仰(46)

解放前的民革上海临时分会陆印泉(55)

上海解放前民盟的战斗尚 丁(65)

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与下关血案甘 田(85)

回忆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吴 茵(104)

利众书报案始末许士林(113)

争取吴化文将军起义的经过王一民口述 魏予珍整理(123)

——农工民主党地下斗争的侧面

大革命前夕上海学联与大学同志会斗争片段周煦良(129)

记香港业余联谊社	时宜新(134)
上海保险业统战工作的回忆	林震峰 郭雨东 戚白明(146)
在群众中生根开花	职青联史料编写组(157)
——回忆解放前职青联的活动	
上海解放前后的工商经济	
研究会	工商经济研究会史料编写组(165)
记上海孤岛时期的《每日译报》	程 豪(177)
经济周报社的合法斗争和统战工作	盛慕杰(192)
我对合作共事的感受	宗之琥(200)
我热爱社会主义	强锡麟(206)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沈莱舟(212)
记长乐路一个地下秘密机关	李庆发 赵茅兴 魏瑞英(221)
无形的战斗	汤有光(231)

纪念杨杏佛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刘 澜 涛

五十年前的今天，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武装围剿的同时，在上海和整个蒋管区疯狂地进行政治围剿和文化围剿。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无数英勇的民主斗士昂首挺胸，和反动派搏斗，壮烈牺牲，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杨杏佛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一九三三年三月杨杏佛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的身份，受同盟主席宋庆龄的委托，到北平视察政治犯监狱。我和薄一波、安子文、刘尊棋等被关押在所谓“陆军反省院”的共产党员，深深为他的到来和视察所鼓舞。我们向他倾听了反动政府不让我们上前线抗日杀敌，而以残忍手段在狱中凌辱我们的暴行。杨杏佛先生记下了我们的倾诉和抗议，在同盟的机关报上加以发表，我们都为有他们向中外社会揭露反动派的暴行和传达我们的声音，得到广泛的共鸣，而感到高兴。

当我们后来得知杨杏佛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反动派所暗杀的噩耗时，我们陷入深沉的悲痛之中，同时对反动派的卑鄙罪行感到无比愤怒。我们知道，射击杨杏佛先生的枪口，同时也是对着当时人民革命的伟大旗手宋庆龄和鲁迅的。我们认识到，敌人这种卑劣的暴行，不表现他的强大，而是

暴露了他的色厉内荏，穷途末日而已。我们在狱中坚持抗争的信心和决心也就更加坚定。

杨杏佛先生殉难以来五十年间，我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杏佛先生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民民主事业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中国的新宪法保障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纪念杨杏佛先生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同时代人要为捍卫和繁荣杨杏佛诸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年轻一代要学习杨杏佛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伟大精神。

科学先驱 民主勇士

——纪念杨杏佛先生殉难五十周年

严 济 慈

一九一三年，当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尚处于荒漠一片的时候，杨铨（字杏佛）先生与任鸿隽、赵元任、胡刚复、胡明复、竺可桢、周仁、秉志、王琿先生等人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他们感奋于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唤醒沉睡着的中华祖国，于是在伊萨卡康乃尔大学校园内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学术团体。稍后，由与杨铨先生在中国公学同学、后来留学法国的何鲁先生在巴黎主办的“学群”组织也与在美的中国科学社联合，而仍保留中国科学社之名。这样，在海外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便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先导。杨铨先生等人则不愧为我国科学界的先驱。

一九一七年，杨铨、胡明复、胡刚复先生等先后回国，把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中国科学社的社址就设在明复、刚复先生的胞兄胡敦复先生所创办的大同大学内。为了推动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用中文发表的学术刊物——《科学》月刊。杨铨、胡明复先生等为办好《科学》月刊付出了许多辛劳，并积极培养、协助上海华丰印刷厂，使这个原来只以印制名片、贺年片为业的小厂转而承印《科学》月刊。《科学》月刊

上主要登载一些论述科学的重要性、探讨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科学评论等文章,对推动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青年》杂志曾多次对《科学》月刊予以介绍。因此,中国科学社深得社会各界名流孙中山、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等先生的赞赏。

一九二〇年前后,何鲁、胡刚复、杨铨、竺可桢、周仁、秉志先生等先后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他们为了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通过张謇先生出面,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谋得一处官产房屋,办起了一个图书馆和讲演室。这就成为中国科学社的新社址。由于缺少经费(它来源于社员缴纳的会费),图书馆的图书是从各位先生家里的藏书搜集来的,讲演室也显得十分窄小,无怪乎当时应中国科学社邀请来华访问的英国罗素爵士就只好在这个新社址的院子里露天进行他饶有风趣、颇受欢迎的学术讲演了。

这时,我正在南京高等师范上学。虽然没有听过杨铨先生的课,但我对他的敬重如同对我的老师何鲁、胡刚复等先生的敬重一样。因为在这期间,刚复先生兼任图书馆馆长,他的家眷在上海,图书馆就成为他的工作室和起居室,馆里只有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荣幸地得到刚复先生的信任,经常出入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编目分类,甚至代为《科学》月刊初审稿件,而杨铨、何鲁先生就住在图书馆的附近,他们经常来馆里与刚复先生一起研究社务与教务,所以,在几年时间里,我亲眼见到杨铨、何鲁、胡刚复等先生为中国科学社和南京高等师范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向他们请教了不少知识,学习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态度,以及为科学和民主而献身的精神。正因如此,当我一九二三年刚刚毕业时,就被例地被中国科学社接受为正式社员(当时凡未出国留学人员加入中国科学社的,只能称为“仲社员”);这年秋天我赴法留学深造时,何

鲁、胡刚复、杨铨等先生曾在中国科学社为我设宴送行。

一九二七年我从法国回国时，中国科学社已迁回上海。一九二八年，中国科学社在苏州东吴大学召开年会，我与杨铨先生等同时出席，我们都是自带铺盖，利用学校假期，住在大教室里，大家深入切磋学术，认真研究社务，尖锐批评时政的情景，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印象。杨铨先生是一位活跃人物，他多次大声疾呼要为一个“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做”的新社会而奋斗。在这届年会上，我当选为中国科学社的理事。

后来，中国科学社经过杨铨先生等人的努力，又先后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开办了“明复图书馆”（为纪念一九二七年游泳溺死的胡明复先生而命名），在上海法租界福煦路创办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同时，中国科学社还曾几次派出学者到菲律宾出席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学术会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推定蔡元培、李煜瀛等先生为筹备委员。十月，大学院成立，中央研究院为其下设机构，即决定由大学院长蔡元培先生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杨铨先生则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的身份兼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至一九二八年四月，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仍为院长，杨铨先生则任总干事，协助蔡先生管理院务。虽然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但由于蔡先生、杨先生的组织领导，中央研究院后来在机构、人员和科学研究工作上还是有所发展的。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地开展，它们对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贡献，都是与杨铨先生等人多年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杨铨先生的难得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为争取民主自由矢志不移的社会活动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他和任鸿隽、何鲁先生等都是以在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有功而被选派出国深造的。北伐时期，杨铨先生跟随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担任秘书；中山先生逝世后，又回上海任丧事筹备处总干事。从此，他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坚定的追随者，国民党中的一员左派。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九路军义士奋起抗战，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杨铨先生积极协助宋庆龄女士，向人募款，向交通大学商借房屋，为伤兵设立了一所有三百个床位的战时医院。同年十二月，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抗日救亡进步人士的迫害，营救被捕的革命志士，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铨先生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女士任主席，蔡元培先生任副主席，杨铨先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在宋庆龄女士的领导下，杨铨先生积极奔走，保护和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如廖承志、陈赓、许德珩、丁玲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等。十二月十七日，杨铨先生到北平营救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国民党宪兵秘密逮捕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先生。当时，我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所长，并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杨先生住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交通旅馆（即解放后国家海洋局旧址）。他在百忙中还到我们物理研究所以及赵承嘏先生领导的药物研究所参观、了解情况，我也曾去旅馆看望他。他认为我们物理所、药物所尽管人员、经费少，设备条件较差，但是办得是很有成绩的，做出了一些很有水平的工作。这件事也说明杨铨先生在从事紧张的革命活动中，还时刻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

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动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揭露了特务机关任意蹂躏人权、屠杀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于是蒋介石就命令特务头子戴笠派上海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公然枪杀了杨铨先生。杨铨先生殉难的地点离宋庆龄女士的住宅不远，蒋介石妄想以此来恐吓宋庆龄女士。杨铨先生殉难时，我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迁沪事正逗留上海，惊闻噩耗，痛失先生，二十日杨铨先生入殓，我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面对先生遗体，悲愤不已，不禁泪下。呜呼！杨铨先生殉难时，年仅四十岁耳！后来，中央研究院将上海原白利南路工学研究所大楼（原工学实验馆）命名为“杏佛馆”，以表示对杨铨先生的纪念。

杨铨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伟哉！壮哉！他的第一大功绩是参与创建中国科学社，兴办现代科学教育，筹组建立中央研究院，实为我国科学界的先驱之一。他的第二大功绩是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及参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直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实为争取民主自由之勇士。

伟哉！创学社，兴教育，科海荒漠擎火炬，智慧照人；
壮哉！组同盟，争民权，刀丛荆棘举战旗，肝胆殉国。

怀念杜重远先生为革命献身

张 承 宗

杜重远先生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是吉林省怀德县人。一九一七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工业。一九二三年回国后，在沈阳创立肇新窑业公司，逐渐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窑业企业之一。一九二七年，被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与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先生等相识，为东北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不战而放弃东北，国土沦丧，家乡沦陷，不但使他惨淡经营的事业全部遭受损失，他的实业救国的幻想也从此破灭，思想上发生很大转变，决心投身救亡运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一·二八淞沪战役以后，杜重远由平津南下，到了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胡愈之等进步人士往来，经常在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撰写抗日救国的文章。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生活》周刊在国民党的迫害下停刊，韬奋被迫出国。杜重远继《生活》周刊之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创办《新生》周刊，担任总编辑和发行人，每期撰写《老实话》，揭露日寇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新生》发行量达十几万份，风行全国。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刊登了署名易水，题为《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

当局竟循日本的无理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将杜重远逮捕判刑。他在法庭上愤激地说：“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在《新生》周刊的终刊号上，刊出《告别读者诸君》，号召“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杜重远先生热爱祖国、积极救亡、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至今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很多读者在杜重远和韬奋影响下，组织了“新生读者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杜重远先生又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民主人士。他是民族工业家，又是进步文化人，“新生事件”后，在华南、华北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的广泛反响，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加深，一九三六年两广就酝酿了反蒋抗日事件。杜重远先生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力量。他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配合做好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曾在狱中写信给东北军中的好友，呼吁团结抗日。一九三六年春，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顺道来沪，和杜重远秘密商谈合作抗日。同年九月，杜重远出狱，即去西安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不久，爆发西安事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当时杜重远先生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促进作用。

杜重远先生还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反帝反封建战士。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杜重远奔走各地宣传救亡。为了抗日，他拒绝了国民党的胁迫、利诱，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决心到交通闭塞、封建军阀盘踞的新疆去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他携带家属奔赴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从内地聘请沈雁冰、张仲实、

萨空了、沈志远、赵丹等为教授，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赴伊犁等地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民主，遭到盛世才的嫉恨，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被捕入狱，备受酷刑。一九四三年盛世才调离新疆前，竟把他秘密处死，至今连尸骨都没有下落。

杜重远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推动和促进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转变，但是他从未标榜过自己。他光明磊落，赤诚爱国，从主张“实业救国”转变成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坚决的民主战士，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的。“新生事件”发生后，我党就派宋介农（孙达生）同志到监狱去探望他，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实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七七抗战开始后，他不相信蒋介石政权有抗战到底的可能。他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同意下，下决心去新疆工作。新疆学院的教务长也是共产党员。由于杜先生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最久，革命实践使他不断提高认识，愿意跟共产党走到底。他被盛世才关禁时，还表示要到延安或莫斯科去学习，他赤心向党，和我们肝胆相照。

杜重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忠心耿耿，勇往直前。他两次入狱，毫不畏惧，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决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我们永远纪念他。杜重远先生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和重庆，党和人民表示沉痛哀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们将永垂不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杜重远先生的家属和子女作了妥善安排。然而，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丧心病狂地成立“专案”，进行株连。如今拨乱反